

● 管继平

■ 文人尺牍(三十一)

# 冰雪聪明芙蓉色

## ——吕碧城致叶恭绰

“绦帷独拥人争羨，到处咸推吕碧城。”粗略算算，这句诗距今也差不多百年了，估计现在很少人还会记得，百年前有一位叫吕碧城的女子，碧色倾城，才华出众，不仅是中国史上第一位女编辑、第一位女性撰稿人，她还是中国女权运动的早期首倡者，也是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凤毛麟角的才女，虽说当年是“人人争羨，到处咸推”，但如今熟悉或了解她的人，毕竟寥寥。古今多少事、多少人，其实，真正经得起百年磨洗却仍让人所津津乐道的，只是那么几个人而已，而更多的则被人慢慢地淡忘了。不过，大众或可以淡忘，我们的历史文字不会忘记。

出生于诗书世家的吕碧城，其父吕凤岐，字瑞田，安徽旌德人，三十三岁中举，光绪三年四十岁时，又与晚清著名文学家樊樊山为同榜进士，曾任江西学政。瑞田先生原配蒋氏，生有二子，蒋氏去世后，续弦严氏，生有姊妹四人，碧城排行第三。由于父亲思想开明，提倡男女平等，所以碧城几位姐妹全都进入了私塾课堂，尤其是姐妹三人，少时聪慧，皆以诗文闻名乡邑，故有“淮西三吕，天下知名”之称。而姐妹中尤以碧城最为出色，据说她五岁能属对，七岁就能画大幅山水，至十二岁前，已经诗词书画无所不能了。故有诗人赞曰其“自幼即有才藻名，工诗文，善丹青，能治印，并娴音律，词尤著称于世，每有词作问世，远近争相传诵。”如她十二岁时，曾填有一首词为：

绿奴浮春，玉龙回雪，谁识隐娘微旨？夜雨谈兵，春风说剑，冲天美人虹起。把无限时恨，都消樽里。君未知？是天生粉荆脂，试凌波微步寒生易水。漫把木兰花，误认作等闲红紫。辽海功名，恨不到青闺儿女，剩一脸高兴，写入丹青闲寄。

父亲的同年好友、大诗人樊增祥读了这首词作拍案叫绝。当有人告诉他这只是一位十二岁的女孩子吕碧城作品时，他简直不能相信“夜雨谈兵，春风说剑”，居然出自一个女孩之手。后樊增祥奖掖后学，也赠诗鼓励碧城：“聪明天赋与娉婷，记取前生馆朗星。练就才人心与眼，为谁暖热为谁青。”

正当诗书伴读、其乐融融的青葱岁月刚刚开始，一场变故使吕碧城的人生轨迹有了重大转折，其后的坎坷与流离，往往自己也开始未及。由于吕碧城的二位兄长先后早夭，十二岁时，父亲因病而逝，给家里带来了没顶之灾。可能那时有的家族规矩是唯男丁方可继承财产，而父亲歿后，家中除了母亲和四姐妹外，再无他人。于是族人便觊觎她家的财产，并不惜出毒招，唆使匪徒将她们母女幽禁起来。无奈之下碧城只得驰书时任江苏布政使的樊增祥求助，幸得世伯樊大人施以援手，母女因而脱险。然经此事变，吕碧城十岁时即定过亲的乡汪家，见吕门不幸，家道衰落，居然也趁势解除了婚约。在旧时，女子被退亲可是天大的羞辱，其带来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为了保全孩子们的成长，母亲严氏只得放弃家产，带着几个女儿远避他乡，去天津塘沽投奔在那里任盐运使的舅父严凤笙。

其后的故事也颇跌宕。我们知道，对一位思想激进、个性独然的才女，寄人篱下的日子自然不可能长久，尽管舅父对聪明的吕碧城还是有所怜爱的，但没多久，观念就有了冲突，碧城一时激愤，翌日离家出走，只身前往天津。正当她在旅馆里举目无亲身无分文时，天津《大公报》的总经理英敛之找上门来，原来她投书报馆的一封信，偶然被老板英敛之看到，对其文字大为赏识，故亲自登门拜访。可见“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吕碧城在山穷水尽之际，不料上帝又为她打开了另一扇窗”，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遇上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伯乐”与“贵人”。这位英敛之，尽管是旗人出身，但他反对顽固守旧，主张变法维新，是一位思想开明的实业家和教育家。顺便说一句，如今著名演员英达，即是英敛之的曾孙。正因为英敛之不受旧的理念，所以才有他的大胆之举，聘吕碧城为《大公报》第一位女编辑，从此，也开创了中国新闻界的先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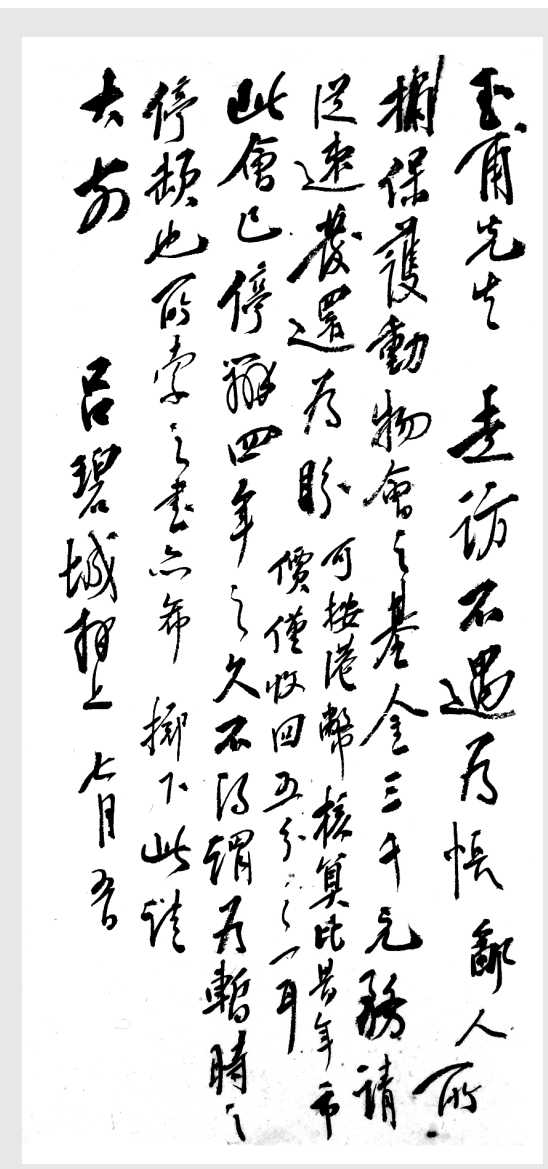
自从有了《大公报》的平台之后，吕碧城的才华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她的诗词文章屡见报端，她的反对男权、提倡妇女解放和女子教育的观点也引起了强烈共鸣，于是，吕碧城的名字在文坛崭露头角，给沉寂的思想界吹来一阵清新之风。随着名声大噪，革命家秋瑾也慕名拜访了吕碧城，原来秋瑾也有

“碧城”之号，但结识了吕碧城之后，两位女性三观相近，一见如故，从此定下了文字之交，秋瑾也就不再以“碧城”为号，免于世人混淆。别后，秋瑾东渡日本图谋革命，吕碧城则在英敛之与傅增湘等人的帮助下，创办了“北洋女子公学”，此校后亦改名“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年仅二十三岁的吕碧城，以其卓越的才能出任了该校的总教习（相当于校长），这在辛亥革命之前的一九〇六年，吕碧城开了风气之先，创下了近代教育史上女子执掌校政的先例。这所学校，成了女子教育的摇篮，曾经培养了冯国璋的夫人周砥，以及邓颖超、许广平等杰出女性。所以，近代女子教育的肇路蓝缕之功，吕碧城当仁不让，外界甚至称她为“北洋女学界的哥伦布”。

正当吕碧城的事业如火如荼之时，一九〇七年七月，却传来了秋瑾在绍兴遇害的消息。吕碧城闻之悲恸良久，限于时势，她只能用英文写了《革命女侠秋瑾传》一文，发表在美国诸多报纸上，以示悼念。但秋瑾被俘后吕碧城也险些遭难，因为官府在抄检秋瑾住处时发现了与吕碧城的往来书信，于是立马发公文欲抓捕吕碧城。幸好此事被袁二公子袁克文知晓，袁克文素来钦佩吕碧城的诗文，虽无缘相识，然渴慕已久。此番不忍心见其落难，于是立即请父亲袁世凯出手救援。袁世凯闻之说道：“若有书信来便是同党，那我岂不是也成了乱党？”吕碧城因此而脱罪。

风波之后，袁克文与吕碧城也算因缘相识，过从由疏渐密，时而诗词酬唱，时而结伴出游。一九一二年，袁世凯登上民国总统宝座，经袁克文之推介，吕碧城还出任了总统府机要秘书，后又担任参政一职。原本她雄心勃勃，欲于政坛上一展抱负，无奈官场毕竟不同于文坛，没几年则心灰意冷，挂职离去。其后吕碧城移居上海，在繁华的十里洋场，她不再摇笔作文，而是凭借聪敏的大脑与丰富的人脉资源，投资了金融和贸易，两三年间，便大有斩获，积聚了可观的财富，置下了上海静安寺路上的洋房别墅。其别墅内陈设豪华，门外还雇有印度巡捕当保安，出入皆一时名流，邀舞聚宴，享受着富裕奢华的上层生活。这也符合她一贯所追求的思想前卫、时尚新潮的习性。郑逸梅曾在《艺林散记》中记载：“吕碧城放诞风流，有比诸《红楼梦》中史湘云者。且染西习，常御晚礼服，袒其背部，留影以贻朋友。”在今天，女子袒露露背已属稀松平常，见怪不怪，但须知一百年前的女子如此大胆，不亚于惊世骇俗了。所幸吕碧城仅是出入于上流社会，在那个层面里，或许彼此尚能承受得起。

吕碧城也是南社社员，她的诗词文章，婉约中见雄奇，别有一格。柳亚子称她“足以担当女诗人而无愧”；词学家龙榆生则赞誉她是“凤毛麟角之才女”“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诗人易实甫也认为其“诗文见解之高，才笔之艳，皆非寻常操觚家所有也”。后来她前往美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学与美术，四年后学成归国。一九二六年，吕碧城再度出国，漫游欧美达七年之久，并将所见所闻著有《欧美漫游录》，先后



吕碧城拜上七月五日

玉甫先生：走訪不遇乃恨斷人所樹保護動物會之基金三千元務請速速發還存款可接港幣核算比昔年市價僅收回五分之一耳

玉甫先生：即民国大家叶公绰，曾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总长、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等职。按吕碧城写此信的时间，若是一九三四年之后的话，或许正是叶公绰于中国红十字会监事的任上。反正是吕碧城向主管此事的叶公绰先生索要一笔当时的捐款，但从信函的语气措辞来看，吕碧城似乎颇无客套之语，直言相陈，闲话少说。吕碧城自小经历了家族之难，退婚之辱，所以她的个性中自有一种倔强和孤傲，即便视其为人文的性格，也素有丈夫之气，用今天的话语形容，就是“女汉子”。我们从这通书札的墨迹来看，落笔雄健豪爽，章法浑然疏松，其线条之凝练生辣，结字之随意圆熟，全无闺阁之态。吕碧城早年家藏万卷，随父在侧，读诗文、写书法、绘丹青、治金石，几乎无所不擅。父亲时将所藏的好友杨秀清山水画供其临摹，杨秀清乃后来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父亲敬仰其为人有担当，胸怀阔大，作品也是笔墨酣畅，风格高标，所以吕碧城自小就受到这种气质上的熏染，下笔也格调大气，不拘绳墨。故后来她致书《大公报》的一封信，让英敛之看了不仅被她的文才所折服，同时也对她一手不俗的书法赞叹不已。

我们从吕碧城留下的多帧照片来看，评赞她“才色双绝”应该不算为过。照片中的她，头戴翠翎，着装为欧式衣裙，一脸英气又不失娇俏，可谓妩媚动人。难怪当时友人描写她“天然眉目含英气，到处湖山养性灵”以及“冰雪聪明芙蓉色”等，我们从这些诗句中，不难感受到她那不同凡俗之美。遗憾的是，如此超凡脱俗的一代才女，最后却成了“一代剩女”。吕碧城一生未嫁，她所属意的男子不是已婚就是太嫩。据说她曾公开对朋友表示：“生平可称许之男子不多，梁任公(梁启超)早有妻室，汪季新(汪精卫)年岁较轻……因此难得相当伴侣，东不成，西不合，有失机缘。”对于有人推荐袁克文，她也明确作答：“袁家公子哥儿，只适合在欢场中偎红依翠耳。”

个性直率如此，又才高气傲特立独行，即便她“有情”，料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连载于北京《顺天时报》和上海《半月》杂志。或也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一九二八年她参加了世界动物保护委员会，并决计创办中国保护动物会，崇尚素食主义。一九三〇年吕碧城正式皈依三宝，成为在家居士，法名“曼智”。

上海图书馆的名人手稿尺牍珍藏中，有一页吕碧城致叶玉甫的书信，虽无年款，仅寥寥数行，但从内容判断，此函至少为一九三二年之后所书。抄录如下——

玉甫先生：专访不遇为恨。鄙人所捐保护动物会之基金三千元，务请从速发还存款(可按港币核算，比昔年市价仅收回五分之一耳)。此会已停办四年之久，不得谓为暂时之停顿也。所索之书亦希擲下。此请大安！

吕碧城拜上七月五日

“玉甫先生”即民国大家叶公绰，曾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总长、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等职。按吕碧城写此信的时间，若是一九三四年之后的话，或许正是叶公绰于中国红十字会监事的任上。反正是吕碧城向主管此事的叶公绰先生索要一笔当时的捐款，但从信函的语气措辞来看，吕碧城似乎颇无客套之语，直言相陈，闲话少说。吕碧城自小经历了家族之难，退婚之辱，所以她的个性中自有一种倔强和孤傲，即便视其为人文的性格，也素有丈夫之气，用今天的话语形容，就是“女汉子”。我们从这通书札的墨迹来看，落笔雄健豪爽，章法浑然疏松，其线条之凝练生辣，结字之随意圆熟，全无闺阁之态。吕碧城早年家藏万卷，随父在侧，读诗文、写书法、绘丹青、治金石，几乎无所不擅。父亲时将所藏的好友杨秀清山水画供其临摹，杨秀清乃后来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父亲敬仰其为人有担当，胸怀阔大，作品也是笔墨酣畅，风格高标，所以吕碧城自小就受到这种气质上的熏染，下笔也格调大气，不拘绳墨。故后来她致书《大公报》的一封信，让英敛之看了不仅被她的文才所折服，同时也对她一手不俗的书法赞叹不已。

我们从吕碧城留下的多帧照片来看，评赞她“才色双绝”应该不算为过。照片中的她，头戴翠翎，着装为欧式衣裙，一脸英气又不失娇俏，可谓妩媚动人。难怪当时友人描写她“天然眉目含英气，到处湖山养性灵”以及“冰雪聪明芙蓉色”等，我们从这些诗句中，不难感受到她那不同凡俗之美。遗憾的是，如此超凡脱俗的一代才女，最后却成了“一代剩女”。吕碧城一生未嫁，她所属意的男子不是已婚就是太嫩。据说她曾公开对朋友表示：“生平可称许之男子不多，梁任公(梁启超)早有妻室，汪季新(汪精卫)年岁较轻……因此难得相当伴侣，东不成，西不合，有失机缘。”对于有人推荐袁克文，她也明确作答：“袁家公子哥儿，只适合在欢场中偎红依翠耳。”

个性直率如此，又才高气傲特立独行，即便她“有情”，料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想一般人也未必敢“有意”吧？

8月28日正值农历七夕，笔者有幸应邀参加了“相约七夕 甜爱一生——上海书法名家书写结婚纪念证书仪式”。活动分“诵读吟咏”和“手写纪念婚书”两部分，其中，著名书法家刘小晴、戴小京、黄仲达、杨耀扬等现场用楷书为八对新人书写“婚书”，著名篆刻家韩天衡先生特别为此活动创作“百年好合”并亲手钤印的印象最为深刻。当书法家们把写好的“结婚纪念证书”送到新郎新娘手里时，顿时，在场的观众无不为之动容，掌声不断！

说到“婚书”，据史料记载，早在周朝就有婚书出现，书于竹简，男女双方各持其半以作婚姻凭证。不过，人们看到最早的仅是敦煌文献中的唐代婚书，《唐律》规定，男女缔结婚姻，两家需互报婚书。南宋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也对“婚书”作了详细记载“凡娶媳妇，先起草帖子，两家允许，然后起细帖子”。但也有后人以为，太平天国的“龙凤合挥”才是最早的“婚书”，理由是它将婚姻纳入了国家管理。到了清朝，民国，“手写婚书”更为流行，尤其是民国时期，证词古朴典雅且浪漫，使得不少青年人为之兴奋，甚至喊出：让我们去民国拿一次结婚证吧！近年，有的地方开也起了定制“手写婚书”的店铺和微商，有的新人到婚姻登记中心办理好结婚证后，还觉得不过瘾，又到摊位上去购买空白的“老式”婚书，请当地书家为他们书写，视作一份最珍贵的礼物。

由此，笔者想到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与吴树琴1939年12月31日在重庆结婚时的那张手写“结婚证书”，现藏于陶行知先生的故乡安徽省歙县陶行知纪念馆。“婚书”是陶行知先生亲手制作的，浪漫诗情，别具一格：“天也欢喜，地也欢喜，人也欢喜，喜欢你遇见了我，我也遇见了你。当时你心里有了一个我，我心里有了一个你，从今后是朝朝暮暮在一起……”这份“诗歌证书”虽已过去了七十几个春秋，但人们依然为之敬慕，一纸婚书，一种责任。

如今，全国各地以收藏“婚书”的人也日渐增多，有的地方还成立了婚书文化陈列馆、展示馆，举办婚书展及相关讲座等。笔者曾两次参观过婚书收藏展，也为之感叹过，那泛黄的婚书背后的确蕴藏着许多动人的故事，蕴含着婚书文化的变迁与历史的进步。“婚书”寄托着世人的深情厚意，也记载着历史积淀的时尚。

上海以官方名义在海派文化中心举办“手写纪念婚书”活动，见证婚姻，书写幸福，可谓是一件有创意、有意义之盛事，也足以反映了对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弘扬。正如市文联党组书记尤存所言：今天两个“非遗”一堂见证，一个是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书札，一个是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七夕节”。因此，此次“手写纪念婚书”不是简单的再现，而是非遗文化与现代生活的深度融合与发展。

让“非遗”回归生活是非遗传发展的重要途径。书法与七夕节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节与非遗传结合，更能全面生动的诠释中国非遗的魅力与保护成果。两项“非遗”虽有其独特性，但更多的是交融，一种存于生活的“生活文化”。所以，“手写纪念婚书”不仅是一种文化仪式，更重要的是在传承一种文明，启迪一种精神。通过书法家书写也是为了让“非遗”进行专业性传承，恢复其生活本色，还原其生活状态，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从而，引导广大群众对“非遗”的认同，让传统与时代的文脉一并贯通。

让书法贴近生活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书法家的责任与义务。中国书协副主席陈振濂说：“中国书法发展至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与实际生活脱节。书法的实用价值丧失殆尽，仅余下作为艺术的审美价值。”上海通过书法家“手写纪念婚书”就是为了在书法家中倡导让书法走进百姓、贴近生活。纵观历朝历代的传世经典书法作品大多都是源于生活，什么信札、便条、公文、日记、自作诗等，就是传世的碑刻也多为现实用途及文献记录等。刘正成先生也曾提出“书法艺术作品必须反映生活，表达文化价值选择”。不同意“书法艺术同书写的文词无关说”，他建议书法家不能去当“文抄公”。书法家应注重日常的书写与感言记事的积累，努力服务人民，践行“艺术为人民”的宗旨。

“手写婚书”好似一种穿越时代之感，尽管“婚书”经历过很多世事的变迁，但我们传承的始终是有情人终成眷属！透过纸背的幸福，今天已别于昨天，在法定生效的前提下，是对新人的一种祝愿，是一种浸润心灵、启迪人心的文化力量。

● 杨祖柏

# 也说「手写婚书」

■ 简斋闲语

很情趣。但也有人评其书雕琢气太重。郑燮的六分半书主要取法《瘞鹤铭》的占拙奇峭，同时也从颜真卿的《争座位帖》中获得灵感，此帖最大的特点是变化丰富，好似随手拈来。因为擅画，其书法作品中往往有一种画意。

《行书诗轴》清翁方纲纸本纵127厘米横30.5厘米

尽管晚明书法已有相当影响，然因时过境迁，清代前期的书坛表现，除尚未形成气候的少量篆书创作外，基本上还是以秀丽流美的董其昌书风和累代相传的固有“帖学”方式为主流，彼时最负名声的有以“翁(方纲)、刘(墉)、梁(山舟)和王(文治)”为代表的所谓“帖学四家”中，翁方纲是最耐人寻味的一位。在书法创作上，他以正统帖学书风称雄乾、嘉两朝，享誉极高。在书学理论上，同时又是一位精研金石碑版之学的权威人物。这一实践和研究的表面互为矛盾、内中却互为关联的现象，反而从另一侧面丰富了翁方纲在彼时书坛的双重地位。翁方纲书作以行书为主，他恪守传统书法的书写原则，究于点画结构的出

清郑燮纸本纵1044厘米横545厘米

郑燮即郑板桥，扬州八怪之一，其成就仅次于金农。以画兰竹闻名，亦擅书法，自评己书为“六分半书”。通常称隶书是八分书，他认为自己的字像隶书又像行书，是篆隶掺和行楷的书体，因此称之为六分半书。有人评其书为乱石铺街，布局上错落有致，这一点在他夹杂着篆隶的行书作品中多有体现。

《行书论学轴》

清郑燮纸本纵1044厘米横545厘米

郑燮即郑板桥，扬州八怪之一，其成就仅次于金农。以画兰竹闻名，亦擅书法，自评己书为“六分半书”。通常称隶书是八分书，他认为自己的字像隶书又像行书，是篆隶掺和行楷的书体，因此称之为六分半书。有人评其书为乱石铺街，布局上错落有致，这一点在他夹杂着篆隶的行书作品中多有体现。

《行书论学轴》

清郑燮纸本纵1044厘米横545厘米

## 上海博物馆藏历代法书述略

刘一闻

(十二)

《隶书流溪词轴》

清郑燮纸本纵1044厘米横545厘米

郑燮即郑板桥，扬州八怪之一，其成就仅次于金农。以画兰竹闻名，亦擅书法，自评己书为“六分半书”。通常称隶书是八分书，他认为自己的字像隶书又像行书，是篆隶掺和行楷的书体，因此称之为六分半书。有人评其书为乱石铺街，布局上错落有致，这一点在他夹杂着篆隶的行书作品中多有体现。

《行书论学轴》

清郑燮纸本纵1044厘米横545厘米

郑燮即郑板桥，扬州八怪之一，其成就仅次于金农。以画兰竹闻名，亦擅书法，自评己书为“六分半书”。通常称隶书是八分书，他认为自己的字像隶书又像行书，是篆隶掺和行楷的书体，因此称之为六分半书。有人评其书为乱石铺街，布局上错落有致，这一点在他夹杂着篆隶的行书作品中多有体现。

《行书论学轴》

清郑燮纸本纵1044厘米横545厘米

郑燮即郑板桥，扬州八怪之一，其成就仅次于金农。以画兰竹闻名，亦擅书法，自评己书为“六分半书”。通常称隶书是八分书，他认为自己的字像隶书又像行书，是篆隶掺和行楷的书体，因此称之为六分半书。有人评其书为乱石铺街，布局上错落有致，这一点在他夹杂着篆隶的行书作品中多有体现。

《行书论学轴》

清郑燮纸本纵1044厘米横545厘米

郑燮即郑板桥，扬州八怪之一，其成就仅次于金农。以画兰竹闻名，亦擅书法，自评己书为“六分半书”。通常称隶书是八分书，他认为自己的字像隶书又像行书，是篆隶掺和行楷的书体，因此称之为六分半书。有人评其书为乱石铺街，布局上错落有致，这一点在他夹杂着篆隶的行书作品中多有体现。

《行书论学轴》

清郑燮纸本纵1044厘米横545厘米

郑燮即郑板桥，扬州八怪之一，其成就仅次于金农。以画兰竹闻名，亦擅书法，自评己书为“六分半书”。通常称隶书是八分书，他认为自己的字像隶书又像行书，是篆隶掺和行楷的书体，因此称之为六分半书。有人评其书为乱石铺街，布局上错落有致，这一点在他夹杂着篆隶的行书作品中多有体现。

《行书论学轴》

清郑燮纸本纵1044厘米横545厘米

郑燮即郑板桥，扬州八怪之一，其成就仅次于金农。以画兰竹闻名，亦擅书法，自评己书为“六分半书”。通常称隶书是八分书，他认为自己的字像隶书又像行书，是篆隶掺和行楷的书体，因此称之为六分半书。有人评其书为乱石铺街，布局上错落有致，这一点在他夹杂着篆隶的行书作品中多有体现。

《行书论学轴》

清郑燮纸本纵1044厘米横545厘米

郑燮即郑板桥，扬州八怪之一，其成就仅次于金农。以画兰竹闻名，亦擅书法，自评己书为“六分半书”。通常称隶书是八分书，他认为自己的字像隶书又像行书，是篆隶掺和行楷的书体，因此称之为六分半书。有人评其书为乱石铺街，布局上错落有致，这一点在他夹杂着篆隶的行书作品中多有体现。

《行书论学轴》

清郑燮纸本纵1044厘米横545厘米

郑燮即郑板桥，扬州八怪之一，其成就仅次于金农。以画兰竹闻名，亦擅书法，自评己书为“六分半书”。通常称隶书是八分书，他认为自己的字像隶书又像行书，是篆隶掺和行楷的书体，因此称之为六分半书。有人评其书为乱石铺街，布局上错落有致，这一点在他夹杂着篆隶的行书作品中多有体现。

《行书论学轴》

清郑燮纸本纵1044厘米横545厘米

郑燮即郑板桥，扬州八怪之一，其成就仅次于金农。以画兰竹闻名，亦擅书法，自评己书为“六分半书”。通常称隶书是八分书，他认为自己的字像隶书又像行书，是篆隶掺和行楷的书体，因此称之为六分半书。有人评其书为乱石铺街，布局上错落有致，这一点在他夹杂着篆隶的行书作品中多有体现。

《行书论学轴》

清郑燮纸本纵1044厘米横545厘米

郑燮即郑板桥，扬州八怪之一，其成就仅次于金农。以画兰竹闻名，亦擅书法，自评己书为“六分半书”。通常称隶书是八分书，他认为自己的字像隶书又像行书，是篆隶掺和行楷的书体，因此称之为六分半书。有人评其书为乱石铺街，布局上错落有致，这一点在他夹杂着篆隶的行书作品中多有体现。

《行书论学轴》

清郑燮纸本纵1044厘米横545厘米

郑燮即郑板桥，扬州八怪之一，其成就仅次于金农。以画兰竹闻名，亦擅书法，自评己书为“六分半书”。通常称隶书是八分书，他认为自己的字像隶书又像行书，是篆隶掺和行楷的书体，因此称之为六分半书。有人评其书为乱石铺街，布局上错落有致，这一点在他夹杂着篆隶的行书作品中多有体现。

《行书论学轴》

清郑燮纸本纵1044厘米横545厘米

郑燮即郑板桥，扬州八怪之一，其成就仅次于金农。以画兰竹闻名，亦擅书法，自评己书为“六分半书”。通常称隶书是八分书，他认为自己的字像隶书又像行书，是篆隶掺和行楷的书体，因此称之为六分半书。有人评其书为乱石铺街，布局上错落有致，这一点在他夹杂着篆隶的行书作品中多有体现。